

新人文对话录丛书

莫大言

王尧

对话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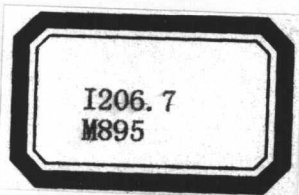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SUZHOU UNIVERSITY PRESS

新人文对话录丛书

王尧 林建法 主编



对话录

王尧

莫言

I206.7
M895

Qay/66/05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莫言王尧对话录/莫言,王尧著. - 苏州: 苏州大学出版社, 2003. 12

(新人文对话录丛书/王尧,林建法主编)

ISBN 7-81090-244-X

I. 莫… II. ①莫…②王… III. ①文艺批评-中国-文集②文化-评论-中国-文集 IV. I206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0179 号

▼ 莫言王尧对话录

著者/莫言 王尧

责任编辑/陈长荣 欧阳雪芹

出版发行/苏州大学出版社

(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215021)

经销/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刷/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/2003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/197 千

印张/10

印数/1-10000 册

书号/ISBN 7-81090-244-X/I·10

定价/19.00 元



总序

王尧 林建法

我们想在“对话的时代”以“新人文对话录丛书”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，纪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。

20世纪90年代那场未果的“人文精神”讨论，凸显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期开始的分歧。这一分歧，不仅源于人们对人文传统认识的差异，也与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变化了的现实有关。这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现实，在这样的现实中，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处境的体认和表达渐趋分化。对中国的、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的解释，一直有仁智之见。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开始使用的“人文主义”这个词，即使在西方也是含义多变的，在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中，“人文主义”的定义不尽相同。所以，“人文主义”虽然在中国广为使用，看似约定俗成，但其实是个概念含混的词。“人文”就字面而言，中文与西文相仿。《易经》云：“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显然，“人文”的中西涵义有差别，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中的“人文”涵义也有差别。因此，有学者建议不妨把“人



文主义”译成“唯人论”或“人学”，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命名。正因为是“人学”，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。即使智者仁者对中国是否有“人文精神”存在着分歧，对西方“人文主义”也有不同的理解，但是不管怎样，“人文知识分子”需要对历史特别是现实作出独立的解释，需要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作出深刻的反省，需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作出清醒的判断。这样的解释、反省与判断，不仅可以见出理论与思想力量的强弱，思考路径的异同，而且也可以分别出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立场。

因此，我们试图在分歧中寻找出交结点，寻找出相同的话题，就像美国的《人文》杂志所希望的那样，“不同学科的写作，能够指向一个发展中的、普遍的思想核心，作者用相互关联的眼光和方法，从不同的视角阐述核心问题”。在这种求同存异的阐述中，我们放弃那种急于给思潮、群体和问题定论的做法，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仓促，而且过于自信。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、遭遇的问题，都迫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信念和勇气去面对，去思和想。无论我们以暧昧的方式，还是以直面的姿态对待历史、现实和未来，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，总有一些问题蛊惑着思想者。也许，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



的底线，守住这一底线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裸露出他的立场。掩饰也是一种立场。从这个立场出发，去发现真正而动人的问题，表达自由和独立的思想，呈现被抑制的生命感受，应当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追寻的思想风度。“新人文”对话录之“新”，不是宣示一种已经成熟的思想，而是表达我们对目前所做工作的期待。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“新人文”这一提法，它虽然和种种人文主义传统相联系，但是它不在“保守主义”和“激进主义”之间徘徊，也撕去了“左翼”和“右翼”的标签。

在这套对话录丛书策划的过程中，我们（“我们”已经是个不能轻易使用的词）首先感觉到我们一些所谓的“人文知识分子”，其实愧对“人文”二字和“人文知识分子”的称谓，因为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回应现实时，我们不时感受到自己的狭隘和无力，感受到清理知识与思想背景的重要。事实上，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视域，不能清理知识体系和思想背景，那么，所谓的“批判”和“创新”也就成了一句空话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已经有过株守疆域、止步藩篱的教训。所以，我们期待有一次思想的飞翔。由这套丛书结集起来的一批人，基本上是“人文知识分子”一类。我们在各自的对话中，几乎都讨论到“知识分子”问题。尽管大家对“知识分子”有大致相同的理解，但都非常谨慎地



使用“知识分子”这一概念。一些朋友不敢轻易地称自己为“知识分子”；而另外一些朋友则毫不犹豫地以“知识分子”相称，并且鲜明地突出自己认为的知识分子立场。由这套丛书的“思想状况”，大致可以见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部分轮廓。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的种种解释，散发着各自生命的体温，在一定意义上，这套对话录丛书也是对话者的精神自叙。西方哲人说过，一些人是发现真理，一些人发表意见。我们当然是属于后者，而且是那种不羞于发表错误意见的一些人。

这样一点自我认识，其实也与对话体这一自由文体的特征相吻合。试图推动对话文体发展，也是我们的企图之一。那种面对面的对话，改变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，创造了一种思想的现场。也许，在讨论问题时对话可能失之于粗疏，但是，对话因此而呈现了思想的原生态，因此而与其他文体相区别。正是在对话之后，我们发现了对话的不易。所以，在这套丛书即将付梓之际，作为主编，我们由衷地感谢应邀参加对话的朋友们，感谢苏州大学出版社以及负责此项工作的陈长荣先生，感谢喜欢和不喜欢这套书的读者。读者也是我们的对话者。



1
童年记忆

51
黑色精灵

99
发现民间

141
小说气味

195
超越故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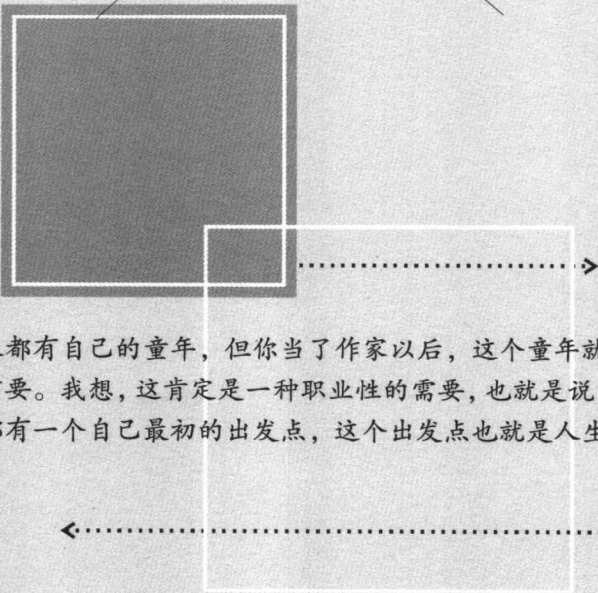
227
海外影响

277
碎语文字

307
后记

目
录

童年记忆

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，但你当了作家以后，这个童年就显得特别重要。我想，这肯定是一种职业性的需要，也就是说，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最初的出发点，这个出发点也就是人生的出发点。

王尧：现在已是2002年年底了。秋天我曾经想去北京访问你，做完这次对话，也很想到你家吃羊肉水饺——听说你请一对夫妻吃饭，那丈夫不吃水饺，那妻子不吃羊肉，但你们家却包了羊肉水饺？

莫言：很抱歉，我认为羊肉水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，怎么还会有人不吃？事实证明，后来他们都还是吃了。

王尧：转眼已经冬天了，还要劳驾你到苏州来。我想，我们争取在圣诞节前做完这个对话。说是对话，主要还是想听你的高见。我知道，你不太喜欢说“思想”、“知识分子”这类词，这不要紧，我们就随便地漫谈吧，谈谈往事，谈谈天气。

莫言：“思想”、“知识分子”，在这些词汇没有准确定义之前，还是不谈为妙。咱们还是“今天天气哈哈”吧，不过，我真怕这样的废话整理出来，既浪费纸张，又贻误读者。

王尧：也许用这样的态度，会谈出一些好玩的东西。

莫言：好，权当聊天。即便将来你整理发表，也只允许你用马粪纸印刷。

王尧：好，我们印在马粪纸上。你昨天来苏州时看我的眼光和以前不一样，等到后来你说发现我有点老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了原因。我现在也发现自己头发白得越来越多，气色也有些苍老，似乎很难摆脱一脸的疲倦。我父亲的头发基本上白了，但在父亲身上看到人老了以后的童真。人有两个童年，一次是少年之前，一次是老年以后。我和你的第一次童年已经遥远了，只有在记忆中才是近的。冬天特别让我想到童年，那时的冬天太冷了，冷得直发抖的样子，

我到现在想起来都发抖，而且是饥寒交迫。你也有这样的经验。人对童年饥饿和寒冷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。童年生活应该说对自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，故乡的小巷子就是自己的血管，稻草就是自己的头发。童年的经历和记忆一定影响自己后来的心理和精神历程。

莫言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，但你当了作家以后，这个童年就显得特别重要。我想，这肯定是一种职业性的需要，也就是说，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最初的出发点，这个出发点也就是人生的出发点。所以，故乡、童年、乡土这几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，可以综合起来谈。我想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纪，似乎还没有资格来谈童年、谈故乡，仿佛一坛老酒，窖藏的年头还不够，强行开封，滋味就不够醇厚。这种半自传性的谈话，应该再老一点，到七八十岁了再谈比较合适。

王尧：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立场、记忆和想法，而且童年的某些部分其实已经被我们遗忘了。

莫言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感觉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眼前发生过的事情

可能马上就忘记了,上午发生过的事情下午就记不大清了,两天以后就可能忘得干干净净的了。但好多20年前、30年前甚至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倒是记得牢牢的,这说明人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,起码是步入中年甚至是老年了。

王尧:趁现在还记得牢的时候多说点,免得以后让一些学者来考证。有些事情不说,会以讹传讹。

莫言:好吧,那就厚颜无耻,自己抬举自己,先把自己幻想成一个似乎可以宣传的人物,像阿Q一样。我首先要谈的,是纠正一个年龄方面的谬误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,一直到90年代以前,需要写作家简历,出生年月日都是写1956年3月25日,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日期,涉及到我个人当兵的一段经历。几十年前,在农村当兵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六七十年代正是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,从理论上来讲,中农的孩子也能当兵,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,贫下中农子弟都在那排队等候,哪里轮到你?我从1973年开始验兵,每年都参加体检,心心念念地想当兵,但每年都落空。一直到1976年,趁着村子里的干部带领全村人到外地去挖河,而我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,钻了个空子,偷偷报名,成为一条漏网之鱼,“混进了革命队伍”。此时我的年龄已经是21周岁,21周岁可能是当兵的最后年限了。到了部队,年龄是对自己的一个压力,因为那些新兵比自己小两三岁。我一个新兵,21岁了,比班长年龄还大。一提到年龄,就觉得很羞愧。

王尧:后来就改年龄了。

莫言:1980年要提干的时候,因为超龄一岁,提不

了。提干的最大年龄是 24 岁。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干部部的一个干事，是常州人。这位老大哥给了我一个暗示说，年龄嘛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你们农村兵的年龄很少有准确的，你们的年龄，你们的学历，都是随便填。当然他也没说得很明确，只是暗示，我就回去改了一下。

王尧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不仅在部队，而且在哪个行当里都有这样的现象，我们的政策中常常有“年龄杠子”这一条，有了这一条，好多事情就会一刀切。那个时候好改，出生档案不健全。

莫言：农村孩子出生，在自家炕头上，祖母就是接生婆。你生了孩子，就到当时的人民公社，找民政助理报上个户口，有的拖了好几年也不报户口。人民公社后来撤销，改成乡镇，变动很多，所谓档案，都是一把火烧掉，谁帮你保留啊，不可能保留的。我就跑到乡里面，找了个朋友，开了份证明，改成 1956 年 3 月 25 日出生。那个人笑着说，你们这些闯外的，都回来把年龄改了。大栏村老钱家的大儿子，明明是 1950 年生的，一

下子改成了1958年，比他弟弟都小了，你是不是也多改几岁，改成1960年怎么样？省得将来再回来改。我说，改成1956年就行了。事实上，现在那些干部们的年龄都改小了许多，上边有政策，下边有对策。如果我走仕途，改成1960年，就真会占很大便宜。我们最早有档案，也就是当兵入伍体检表，这个就是最原始的，之前就是空白，你想怎么填就怎么填。后来经过准确查证，我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55年2月17号，那年正好是农历的羊年。

王尧：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后来想想，又不安了。

莫言：后来自己提了干了，当了作家了，老觉得自己瞒了年龄心里很亏的，老觉得是自己心里一块病，感觉是在欺骗别人，欺骗社会，欺骗同志，后来在出书时就把年龄改过来，但身份证上还是1956年。现在要改身份证，那可就非常麻烦了。把这事回去说，他们都笑，说这算什么，老钱家的儿子，已经把出生年龄改成1960年了，最近做为青年干部被提拔成了副市长，如果照实际年龄，他都该退休了。这也不能说我品德好，如果我也在官场上混，没准就要改到1965年出生。

王尧：母亲对孩子的出生时间是记得最清楚的。

莫言：据我母亲说，天将破晓的时候，哪个时辰也搞不清楚，鸡叫头遍。

王尧：生你的时候，你们家已经是个大家庭了。

莫言：那个时候，我家庭里面有很多人，我爷爷奶奶都还健在，很年轻，也就四十几岁，我父亲母亲，我上面已经有大哥、二哥、大姐，叔叔婶婶和我们没分家。我婶婶已经

有一个女孩，比我大四个月。

王尧：我想现在应该说到你爷爷了。你 1985 年前后的中短篇小说，常常喜欢用“我爷爷”这样的提法，你发表的第一篇小说《大风》就是讲“爷爷”的故事，这当然是在写小说，但在生活中你爷爷肯定给你很大影响。

莫言：是的，要说到我爷爷。现在想起来，这个老人很有性格，比较有远见，但非常固执，用我父亲的话讲，就是不会随潮流，杠子头，钻牛角尖，撞到南墙也不回头，永远是和社会对着干的。互助组时他还可以接受，邻亲百家互相帮助嘛，但初级社、高级社、人民公社取消个人资产，搞集体化，他就难以接受。他认为，一家一户，两个兄弟都要分家，不分家就没有积极性，妯娌之间互相都计较，兄弟之间各自想着自家的小家庭，很少能够同心协力地干好一件事，一个大家庭维持很久是不可能的，亲兄弟都不行，这么一帮邻居、一帮互不相干的人合到一块干活怎么可能干好？谁会卖命地生产呢？谁能够把自己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呢？当时社会潮流啊，你如果作为一个单干户，不入社，理论上也